

# 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与苏长和博士商榷\*

王 义 桅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则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以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及其争论首要的即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强权)才能追求到安全(和平)的是经典现实主义(以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争强权,求和平》为代表),认为各国权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及至集体安全(世界和平)与国际道德(国际法)以国际(内)制度、国家间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等来体现,理想主义又发展到自由主义阶段,并派生出国际制度和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组织和和平论等不同主张(拉塞特《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歧与争论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是围绕人性-国家性-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之,产生出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人类两大思维理念的根本分歧: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界的客观层面——自在世界,以战争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它试图洞察国际关系

永恒的本质与终结性因素——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样;也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忽视国内因素,对人设计的各种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上持怀疑态度,以历史的长时段出发来审视现实,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故此,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因素,以历史审视现实。

而自由主义青睐主观层面——人化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量,以自然(公民)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它重视人和制度的作用及历史的偶然性,以未来催生现实。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心忡忡于国家间非正常交往方式(战争、冲突)不同,自由主义关注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及至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一般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而是认为国际社会本身由人的观念与社会实践建构而成,自由主义又发展到建构主义阶段(以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代表)。

奉行权力决定安全的现实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论战中,自身也在分化,形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一支引进国际结构的思想,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相对安全,即所谓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围绕冷战结束及冷战后世界走向的争论则催生出现实主义的新支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以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为代表。

《大国政治的悲剧》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

\* 苏长和的书评文章《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米氏的中国威胁观与其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有两点不同:其一,威胁原因不同。米氏认为中国威胁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以军事力量为基础、以经济财富为后盾的陆上强国的作用,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看待中美冲突,这与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或领导人意志等无关,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其二,威胁内涵不同。米氏并不像历史现实主义那样将中国类比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不满足国际体系现状而挑战之,而是认定中国威胁乃大国政治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任何其他强国崛起都会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形成冲突。中国威胁的不是国际体系,而是美国霸权。

在美国,米氏理论并不惹人喜欢,原因正如书中开篇即谈到的——“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但在国际体系中美国却是“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于是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奇怪现象:“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公开场合却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国际关系与美国理念的分析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米氏毫不掩饰的风格令美国学者咋舌,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学者们对其大加鞭挞,实际也是对米氏批评其理论的反弹,并未引入至学理的争论,最近苏长和博士的书评亦属此类。书评以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口吻对米氏理论大加嘲讽,似乎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展已经找到了真理,米氏还去重弹现实主义老调,执迷不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是一多元化谱系,各学派以不同视角道出部分真理,并不存在科学进化论。纵观古今,现实主义的逻辑远未过时。现实主义解决的是“为什么我们难以超越历史”这一大课题,有历史哲学的逻辑,并非自由主义想像的那样简单;恰恰相反,现实主义是中外国际关系史一以贯之的逻辑之一。为什么现实主义往往以旧瓶装新酒,值得思考,但自由主义常常善于制造漂亮的气球,也经常遭到现实的嘲

讽,比如克林顿时期以自由主义指导的朝鲜核政策,现在看来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幼稚与一厢情愿。

此书在理论层面与政策层面都引起了很大争议,故而有人对其与摩根索、华尔兹相提并论有意见,这可以理解。摩根索、华尔兹的书出来时也未逃脱被诘难的命运,这是现实主义的通性。对现实主义的翻译和理解应力求准确、慎重,至少不要带喜恶色彩。例如,“攻击性现实主义”的译法就不妥,正如 power 不能轻易译为“强权”,感情色彩太浓,会误导读者。作者翻译为“米尔夏默”最恰当。

苏的书评说本书理论基础很简单,这又是对现实主义的偏见,未领会到现实主义返璞归真的境界。标题“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会引起误解,并非原书本意。现实主义指出冲突的必然性,历史以悲剧形式循环往复,但并非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作者指出冲突极有可能发生在中美间,但要视中国经济能否如此快速增长而论,并非没有条件,因而言“即将冲突”会引起误导,借用“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书名,也给人以错觉——似乎这是一本哗众取宠的流行书,实际上刚好相反。

除标题外,书评对权力的理解也值得商榷。作者并未将国家追逐权力与霸权归结为国家的权力本性,而是将权力与安全不恰当结合。文章末尾尤其难以令人信服。现实主义的逻辑不是肯定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正当性,而是权力逻辑的无奈。现实主义对待权力的态度并非无法无天。摩根索书中亦深感道德、国际法的不可靠,并非不喜欢或不认可它们。面对时势巨变,现实主义就以其执著和洞察古今的深沉,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向世人呐喊,为我们驱散迷雾,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怎断言在 21 世纪就要“走到尽头”?

本书对外交行为的分析细致入微,在地缘政治论述上也有创新,书评只字未提。不仅如此,文中多次提及“《悲剧》一书的问世,可谓正好迎合了‘9·11’以来颇为动荡的国际形势以及当前美国政府中一些强硬派人士的口味,并为他们所推崇备至”,更是子虚乌有。事实上,此书是米氏“十年磨一剑”,是冷战后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与“9·11”或布什当局无关。其影响与学术名声不因为“9·11”,倒是中国百姓这样误会了,近年的国际形势更加证明了现实主义远未过时。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03-02-20]

[责任编辑:邵峰]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ma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has been reshaped into a new model by utilizing the “new economic surplus” and the “networked fiscal policy”, and by introducing both the “trade-off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nominal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new mechanisms of recession, recovery, and expansion in the “new business cycle” supported by recent experience. As a result, the paper suggests a series of valuable ideas. Based on the “abroad accelerator” the Iraqi War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profit-earning model of enterprises, the paper shows the optimal outlook for an upsurge of the economy, which is shadowed by a cloud of “double deficit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U. 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Chen Jiyong Wang Qingping(64)**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1990s. As an important impetus for globaliz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so grew at record-breaking speed in the 1990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active advocate for and promoter of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U. 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set new records in the 1990s when its choice of locations, industries, and modes changed greatly. In four se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reat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U. 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during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n Xiao(70)****“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Discussion with Dr. Su Changhe****Wang Yiwei(72)****on “World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Discussion with Mr. Feng Zhaokui****He Ying(74)****The Prominence of the Indian Strategic Position****—My Writing of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ndia—A Rising Big Power”****Ma Jiali(75)**